

论宋人对“九龄风度”的接受

马东瑶

内容提要 作为接受研究的个案，论文探讨了在文学作品中成为熟典的“九龄风度”的内涵如何在宋人的解读、阐发与体认中逐渐确立并得到后世认同。通过考察《新唐书》对《旧唐书》张九龄本传的改写，论文提出，宋人所描绘的文学政事皆有所称、外在儒雅而内蕴刚劲的“九龄风度”，其实正体现了时人理想中的新型文士的风范。

关键词 九龄风度 《新唐书》《旧唐书》 新型文士

经典的出现，总是与接受者的参与有着莫大关系，文学作品也好，文人典范也罢，大体如此。宋代以后，在文人作品中作为熟典而常常出现的“九龄风度”一词，正体现着接受与典范化的问题。张九龄，韶州曲江（今广东韶关）人，被称为唐代玄宗朝最后一位贤相。《御览经史讲义》称：“唐之贤臣，姚宋房杜。开元之际，九龄风度。建中克复，浑瑊马燧。……”^①开元时期，政治清明，群英荟萃，而张九龄为何独能以“风度”称誉当朝与后世，以致成为开元的符号？所谓“九龄风度”，到底所指何意？

事实上，“九龄风度”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而有着颇具意味的演变过程，其中又以宋人与力最多，可以说，正是在宋人的接受、阐发和体认中，其内涵才得以真正确立。本文以宋代欧阳修、宋祁所著《新唐书》对后晋刘昫《旧唐书》的改写为考察中心，试图对这一接受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加以探讨。

一 从《旧唐书》到《新唐书》：“九龄风度”内涵的变化

有关张九龄“风度”的记载，最早出于《旧唐书》本传，开元二十四年（736），张九龄罢相，“后宰执每荐引公卿，上必问：‘风度得如九龄否？’故事，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体羸，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笏囊之设，自九龄始也”^②。这一段记载夹杂在张九龄的仕途履历当中，似乎只是对其为相时“风度”出众的一个补充性说明，其“风度”的内涵，也似着眼于其“体羸”而来的病态之美。

到了《新唐书》本传中，在叙述完九龄生平后，始有关于“风度”之记载：“九龄体弱，有酝藉。故事，公卿皆搢笏于带而后乘马，九龄独常使人持之，因设笏囊，自九龄始。后帝每用人，必曰：‘风度能若九龄乎？’”^③作者所添“酝藉”二字颇有意味。古人用到此词，多具宽容含蓄的褒扬之意，如《汉书·薛广德传》：“广德为人温雅有蕴藉。”^④又，清黄生《义府》“酝藉”条：“《汉书·匡张孔马传》赞：‘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酝藉可也。’酝谓醇，藉谓厚，言不露锋芒也。”^⑤这就将《旧唐书》对张九龄“风度”仅指外在仪容的含义改造成兼有内外之美：发于外者为仪容、气度、风采，涵于内者则是修为、学养、

① 《御览经史讲义》卷一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723册，第53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张九龄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096页。

③ 《新唐书》卷一二六《张九龄传》，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24页。

④ 《汉书》卷七一，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047页。

⑤ 黄生《义府》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5页。

品性。这样，作者不仅以“风度”概括和评价了本传前半部分所载九龄诸事，其后特别载录的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安太子瑛、请诛安禄山等最能体现其品节之事，更可谓是对九龄“风度”的进一步强调。围绕着对“九龄风度”的这一界定，在本传中，《新唐书》对《旧唐书》进行了多处取舍与改造。

首先，《新唐书》沿用了《旧唐书》对张九龄幼聪敏而善属文、恪尽谏臣之责、受知于张说而不徇私、进《金镜录》（《新唐书》云《千秋金鉴录》）、劝斩安禄山等事的记载，初步树立起一个躬行直道的贤臣形象。

其次，《新唐书》增补了张九龄关于选士的大段议论，并详述了谏用牛仙客事与安太子瑛事。在《旧唐书》中只字未提的张九龄关于选士的思考，《新唐书》则以大量篇幅加以载录。在这一问题上，张九龄不仅对“方以一诗一判，定其是非”的选才方式提出反思，认为这造成“贤人遗逸”，实为“明代之阙政”；尤其强调用人当“第其高下”，如此，天下之士才会注重自身修为，不妄求干谒。张九龄指出，“古之选士，惟取称职，是以士修素行而不为侥幸，奸伪自止，流品不杂”，今天下则“不正其本而设巧于末也。所谓末者，吏部条章举赢千百刀笔之人，溺于文墨，巧史猾徒，缘奸而奋”，对于当今选士不重修身而为奸猾投机者大开方便之门深为不满。

德才并重本是汉代“独尊儒术”以来选士的基本标准，然自汉至唐，其间多历变动，儒学中衰，选士之法亦多变，张九龄对修身的重视，正体现了在科举取士的制度下，以儒为本的文士不惟重才、尤重德行之思想。事实上，张九龄谏用牛仙客也正是其选士思想的体现。《旧唐书》称：“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这段记载颇易引人误解，似乎张九龄谏用牛仙客是出于他与李林甫政治斗争的私心，而牛氏成为这种争斗的牺牲品。《新唐书》的记载则明显不同：“（李林甫）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可以看出，李林甫引荐牛仙客、张九龄谏用牛仙客，确实有着张、李不两立的政治斗争的因素在其中^①，但张九龄的反对重用牛仙客，并非意气用事，他对尚书一职“德望”的强调、对牛仙客“目不知书”的鄙夷，正体现着以“文学”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张九龄，所重者乃文才与修身，故对出身使典胥吏的李、牛之流不学无术、无才无品深表反感。

南宋洪迈在《容斋随笔》中引录《新唐书》关于张九龄反对牛仙客为尚书事后说：“观九龄集中有《赠泾州刺史牛公碑》，盖仙客之父，誉之甚至，云：‘福善莫大于有后，仙客为国之良，用商君耕战之国，修充国羌胡之具，出言可复，所计而然，边捍长城，主恩前席。’正称其在凉州时，与所谏止尚书事，亦才一年，然则与仙客非有夙嫌，特为公家忠计耳。”^②指出张九龄在谏止尚书事后一年，曾为仙客父作碑并誉之甚多，意在说明其与仙客并无私怨，纯粹只是为公家尽忠而已。不过，细察九龄所写碑文，却也能读出一些言外之意。他对仙客的称赞，仍只限于其任职凉州时——九龄对仙客长于吏事本就没有异议，而对其为相一年来的表现却只字未提——这说明九龄并没有改变他反对仙客担任尚书、宰相等要职的态度。在《新唐书·牛仙客传》中，作者称其“为相谨身无它，与时沉浮，唯唯恭愿”；并引高力士之语曰：“仙客本胥史，非宰相器。”^③对仙客无相才的批评，也正间接地体现出对九龄的一种认可。苏轼更以九龄不用牛仙客事论及士大夫之“名节”，极力称誉九龄能“守正不回”^④。

① 学界多认为这体现了文学与吏治的派别斗争，如汪篪《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② 洪迈《容斋随笔》卷三《张九龄作牛公碑》，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2页。

③ 《新唐书》卷一三三《牛仙客传》，第4554页。

④ 《苏轼文集》卷七《张九龄不用张守珪牛仙客》，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97页。

新、旧《唐书》对张九龄卷入周子谅事的叙述与态度也颇不相同。《旧唐书》称：“初，九龄为相，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至是，子谅以妄陈休咎，上亲加诘问，令于朝决杀之。九龄坐引非其人，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这一叙述对周子谅的得罪被杀语焉不详，但《旧唐书·牛仙客传》有所说明：“时有监察御史周子谅，窃言于御史大夫李适之曰：‘牛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大夫国之懿亲，岂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子谅之言，上大怒，廷诘之，子谅辞穷于朝堂，决配流瀼州，行至蓝田而死。”牛仙客是无所作为的庸才宰相，身为监察御史的周子谅称其“不才”而有所褒贬，本是出于职责和正义，以此身死实为冤案，《旧唐书》却称其“辞穷”、“妄陈休咎”，似颇有贬斥之意；则张九龄的“坐引非其人”似乎也是择人不善、咎由自取。而《新唐书》的记载体现出作者截然不同的态度：“尝荐长安尉周子谅为监察御史，子谅劾奏仙客，其语援讖书，帝怒，杖子谅于朝堂，流瀼州，死于道。九龄坐举非其人，贬荆州长史。虽以直道黜，不戚戚婴望，惟文史自娱。”这一叙述有两点显著不同于《旧唐书》。首先，将《旧唐书》分置于牛仙客和张九龄本传中的周子谅事合并于“张九龄传”中，这就清晰地指出了周子谅之死源于对牛仙客的弹劾，说明这其实仍是张九龄、周子谅的文士派与李林甫、牛仙客的胥吏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其次，尽管张九龄、周子谅以一贬一死惨败于李、牛之流，《新唐书》却以“直道”之语鲜明地表达了称扬之意。此后，宋人对这一事件中的周、张可谓有着众口一词的称誉。范祖禹认为语援讖书的责任完全不在子谅，他从“求长生，悦机祥”而“陷溺其心”的角度，将批判的矛头直指玄宗，认为“古之杀谏臣者，必亡其国”；张唐英强调子谅“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负其职”，杀子谅只能使此后之谏臣噤若寒蝉、不敢直言；郑獬更将杀子谅视为开元治乱之分歧^①。周子谅既为贤臣，“能知人”（张唐英语）却反受牵累的张九龄自然也是值得同情的；尤其是，无罪遭贬却“不戚戚婴望”就更令人钦敬了。在这一事件的叙述中，《新唐书》的最后不仅对张九龄的处贬谪之境而平淡自若、从容坦荡表示赞赏，更以“文史自娱”再次凸显了张九龄的文士身份。

安太子瑛事是《新唐书》详述之而为《旧唐书》所缺者：“武惠妃谋陷太子瑛，九龄执不可。妃密遣宦奴牛贵儿告之曰：‘废必有兴，公为援宰相，可长处。’九龄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帝为动色，故卒九龄相而太子无患。”与谏用牛仙客事的记载相同，《新唐书》再次用到“执不可”三字，这既是张九龄耿直个性的表现，而安太子瑛事所体现的符合封建道德规范的特色，较之谏用牛仙客事更具为人广泛认同的正义性；九龄对宦官牛贵儿亦即对武惠妃之“叱”，则进一步凸显了其义正辞严的刚劲形象。安太子瑛事后来成为体现“九龄风度”中士夫之志不可夺的政治风节的重要事迹，而所不可晓者，《旧唐书》竟只字未提。清人沈德潜便认为：“武惠妃陷太子事，此玄宗治乱之关，九龄、林甫忠奸之分也，旧书不载，不及新书之识。”^②

《新唐书》在张九龄的性格气质上对《旧唐书》的增删修改进一步确立了“九龄风度”儒雅醇厚而立朝谔谔的特色。《旧唐书》称：“（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议者以此少之。”这段评价在《新唐书》中被完全删去，则九龄性格到底如何，是一个须加考察的问题。据《隋书》记载：“自岭已南二十余郡……其人性并轻悍，易兴逆节，椎结踦踞，乃其旧风。其俚人则质直尚信，诸蛮则勇敢自立，皆重贿轻死，唯富为雄，巢居崖处，尽力农事，刻木以为符契，言誓则至死不改。”^③岭南民风，向来偏于亢直豪迈，张九龄自己亦认为“越井殊方，广江剽俗”^④，因此在这种地域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岭南人，具有悍直、狷忿、躁急一类的性格实不足为奇。吕温曾称赞张九龄“抗

① 《历代名贤确论》卷七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687册，第648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后附《考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70册，第206页。

③ 《隋书》卷三一《地理志下》，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887页。

④ 《文苑英华》卷八九九《殿中监张公神道碑》，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4731页。

危言而无所避，秉大节而不可夺，小必谏，大必诤。攀帝槛，历天阶，犯雷霆之威，不霁不止。举为时害，动拂上欲，日与谗党抗行于交战之中”^①，虽是品节的称扬，与性格的刚劲质直亦不无关系。

《新唐书》则完全不提九龄的性“躁急”与易“忿讟”，与此相关的是有两处颇有意味的增补修订。所增补的内容是：“及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当是时，帝在位久，稍怠于政，故九龄议论必极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谔谔”一词，意为“直言”，与“直道”类似，有着对张九龄敢于议论得失、褒贬朝政的明确的赞扬之意，“所推引皆正人”，则是对张九龄实践其选士思想的肯定，同时也是再次肯定张九龄、周子谅的“直道”。所修订的内容是，将《旧唐书》“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的“文行”改为“文雅”。仅一字之别，却颇值得回味。“文行”，为文章德行之意，“文雅”，则指“艺文礼乐”，二者大体都包含了儒家所推崇的“作文”与“修身”的双重意蕴，但“雅”又常含“风雅”、“美好”之意，更具一种文人雅士高洁澹泊的意味。于是，《新唐书》有意删去九龄性躁急的一段评价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新唐书》的描绘中，岭南民风轻悍、质直、勇敢、尚信的特色体现在张九龄身上，是躬行直道、直气鲠词、忠直刚劲，是儒家所推崇的“临大节而不可夺”；而另一方面，张九龄又有着儒士的文采风华、翩翩雅意。“九龄风度”，正于此体现。

须指出的是，后人所认同的“九龄风度”尽管有赖于《新唐书》对《旧唐书》在本传中的大力完善，但《旧唐书》奠定的基础也不可抹煞。除了前文提出的它在本传中塑造了张九龄躬行直道的贤臣形象的雏形，《旧唐书》文末史臣赞语曰“九龄文学政事咸有所称，一时之选也”^②，亦可谓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九龄风度”所涉及的基本内容。尽管《旧唐书》张九龄本传甚少记载文学之事，却在他人尤其是一些文学之士的列传中旁证互见，使张九龄作为文坛领袖的一面和“九龄风度”中文人雅意的特质得以清晰起来。如：

（张）说重词学之士，述与张九龄、许景先、袁晖、赵冬曦、孙逖、王干，常游其门。（《旧唐书》卷一〇二）

（张）说曰：……张九龄之文，如轻缣素练，实济时用，而微窘边幅。（《旧唐书》卷一九〇上）
才名之士王维、崔颢、卢象等常与陟唱和游处。……张九龄一代辞宗，为中书令，引陟为中书舍人，与孙逖、梁涉对掌文诰，时人以为美谈。（《旧唐书》卷九二）

（李泌）善属文，尤工于诗，以王佐自负，张九龄、韦虚心、张廷珪皆器重之。（《旧唐书》卷一三〇）

孟浩然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张九龄镇荆州，署为从事，与之唱和，不达而卒。（《旧唐书》卷一九〇下）

从上可知，张九龄的受知于张说，首先在于他是“词学之士”，这既体现出二张所形成的文士集团在政治派别上的特色，同时也彰显了二张在文坛上的活动。张九龄的游于张说之门，以及被称为“一代辞宗”，揭示出他继张说而成为文坛领袖的事实，而他在文坛的巨大影响力，又得以吸引众多才俊之士游于其门、迭相唱和，从而影响到文坛发展的走向。相比《旧唐书》，《新唐书》在张九龄文学活动上的记载却相当简略，这又该作何解释呢？事实上，这并非说明《新唐书》作者轻视张九龄的文人特质，而其实与他们对《旧唐书》本传的改造具有一以贯之的宗旨。

二 改写策略的背后：欧阳修、宋祁对新型文士的期待

历史，在常人看来自然都是客观的“事实”，但实际上，被历史学家所叙述的历史，“恐怕找不

① 《全唐文》卷六二九《张荆州画赞并序》，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6350页。

② 《旧唐书》卷九九，第3106页。

到不具有意图的叙述”^①。历史叙述早已将历史事实剪裁过了，所以它并非事实，“而是告诉我们对这些事实应当向哪个方向去思考，并在我们思想里充入不同的感情价值”^②。也因此，相同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由于叙述者的不同，可能呈现出大不相同的面貌。由于新、旧《唐书》并存于世，研究者便常常二书并用，按其所需进行摘取，却并未注意到《新唐书》与《旧唐书》其实差异颇大；而这种差异极有深意。

《旧唐书》成书于五代后晋，由宰相刘昫领衔撰写，而五代在宋人看来，是时局混乱、道德沦丧的时期，不足以担当写史之重任。欧阳修起草、曾公亮所呈《新唐书·进表》便认为：“（五代）衰世之士，气力卑弱，言浅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贤臣、隳功伟烈，与夫昏虐贼乱、祸根罪首，皆不得暴其善恶，以动人耳目，诚不可以垂劝戒示久远，甚可叹也。”^③宋人要重修唐史，其意也正在于“垂劝戒示久远”，表现他们不同于五代的历史观与道德观。

《新唐书》由欧阳修、宋祁主笔，另有梅尧臣、宋敏求、张方平、范镇等知名于文学和文化史上的庆历士人共同参与编修，历时十七载完成。欧阳修、宋祁，都是以文学知名于世者，然而在宋代“以文治国”的政策下，文人已非单纯的舞文弄墨之士，而须身兼治国之任，士风问题正是因此受到特别的关注。五代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导致士风凋敝、论卑气弱，宋人有感于此，力图重振士风。范仲淹首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以振作士人品格；而庆历诗文革新的领袖欧阳修，正是范仲淹的同道，他在文学改革中要首先致力于塑造新型文士也就不难理解了。欧阳修不仅主持修撰《新唐书》，此前更独力撰写了《新五代史》，其中对于不少历史人物的褒贬都鲜明地体现着他重塑士风的思考与追求。如对“事四朝，相六帝”的五代丞相冯道的贬斥便可称典型。宋初薛居正领衔撰写的《旧五代史》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体”^④，本颇符事实，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则直斥冯道为“无廉耻者”^⑤，其意正在以励“被服儒者”之士节。同样，《新唐书》对张九龄的叙述颇异于《旧唐书》，亦体现着欧阳修、宋祁这批庆历士人力图振作士风的目的。

《新唐书》列传部分由宋祁主笔，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人物的褒贬与欧阳修无关。宋祁年岁稍长于欧阳修，声望却不及后者，无论作文还是撰史，欧阳修都体现出领袖与主导地位，宋祁则与其保持一致。由于欧阳修后期才进入书局，而宋祁长期外任，两人并没有机会就书的编撰进行面对面的讨论，但他们在写史的诸多问题上却不谋而合，或者说，在共同的庆历文化背景下体现出相当一致的历史观、道德观及文学观，如暴恶扬善，劝戒久远；尊奉《春秋》，推崇韩愈；力排佛老，以明王道^⑥。四库馆臣称：“欧主褒贬，宋主文章。”^⑦意谓二人在《新唐书》的撰写上各有特点，各不相能，但在我看来，“褒贬”与“文章”其实始终是二人共同关注的问题，或正可用欧阳修《论尹师鲁墓志》中的一句话来概括他们在治史写人上的共同特色：“用意特深而语简。”^⑧欧阳修是著名的诗文革新的领袖，而宋祁正是其积极的

① 沟口雄三《关于历史叙述的意图与客观性问题》，孙歌译，见贺照田主编《学术思想评论》第11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H·怀特《叙述的热门话题》，转引自葛兆光《汉字的魔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学札记》，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3页。

③ 《新唐书》卷首。

④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666页。

⑤ 《新五代史》卷五四，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611页。

⑥ 谢保成《关于〈新唐书〉思想倾向的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第178—183页。

⑦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新唐书纠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410页。

⑧ 《欧阳修全集》卷七二《论尹师鲁墓志》，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46页。

拥护者。二人皆反骈尊古^①，语尚简严，体现着尊崇韩柳之文的古文家的写史特色。《新唐书·张九龄传》大段载录张九龄《上封事书》关于选士的议论，既与欧、宋对新士风的思考有关，亦当与他们赞赏九龄之文的明快通达不无关系。而在欧、宋写史的简语之中，又常常暗含褒贬深意。欧阳修善用《春秋》笔法乃众所周知的特点，如赵翼《廿二史劄记》便说：“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②而这一点同样体现在宋祁的写作当中。《新唐书》成，朝廷要求欧阳修“删为一体”，欧阳修却对宋祁所撰列传“一无所易”^③，这恐怕并不仅仅如欧阳发《先公事迹》所称是尊重宋祁为前辈，而当与列传同样具有“语简”而“用意特深”之特色有关。

“九龄风度”正是欧、宋增删改写《旧唐书》、又常暗寓褒贬而清晰起来的。不难看出，《新唐书》除了从九龄文集、《明皇实录》、《国史》等增补了部分内容外，很多时候在基本事实上与《旧唐书》是一致的，只是褒贬态度则大有不同：这种态度有时直接体现在语辞评价上，有时则通过行文的变化、笔墨的轻重、内容的调配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例如《新唐书》对李林甫的态度便可称是暗藏着对张九龄褒扬之意的“春秋书法”。《新唐书》在史著撰写中首列“奸臣传”，表现出一种鲜明的道德批判，李林甫即名列其中。《旧唐书》本传对李林甫的诸多劣迹虽也直笔书来，但最后述其为杨国忠所诬构，仍然指出“天下以为冤”^④。《新唐书》则只列恶行，全盘批判，对李林甫的贬斥一目了然。这种简单化、脸谱化的写史方式，从尊重客观事实的层面来说可谓是一种倒退，不要说不及将人物写得相当立体、丰满的《史记》，就连《旧唐书》也有所不如，然而，这正强烈地体现着宋人要通过写史来“劝戒久远”的目的。李林甫一生有两个最重要的政敌，前期为张九龄，后期为杨国忠。杨国忠与李林甫一样被视作是导致“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新唐书》将之列入“外戚传”，对其也并无好感^⑤；而李林甫所处心积虑对付的张九龄，正是忠、奸斗争中的另一面，《新唐书》将李林甫列入“奸臣传”，本身便暗含着对张九龄的褒扬。

欧、宋看似不重张九龄的文学之事，其实同样暗寓深意。据《宋史·欧阳修传》：“学者求见，所与言未尝及文章，惟谈吏事，谓文章止于润身，政事可以及物。”^⑥欧阳修与张九龄同样身为一代文宗，他却似乎有意淡化文学的价值，目的其实并非自轻文人身份，而是反对文人仅以文章之事自任。正如欧阳修在给后学的信中所说：“夫学者未始不为道，而至者鲜焉。非道之于人远也，学者有所溺焉尔。盖文之为言，难工而可喜，易悦而自足。世之学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则曰：‘吾学足矣。’甚者至弃百事不关于心，曰：‘吾文士也，职于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鲜也。”^⑦欧阳修批评后学只知沉浸于文辞之美的弊病，提出文士当关心百事，由此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⑧。所以，欧、宋并非不看重张九龄的文人身份，恰恰相反，这是他们要改写《旧唐书》、重塑“九龄风度”的基石——张九龄是作为一个文章政事皆有所称的文人典范、同时也正是欧阳修所着力塑造的新型文士的典范而出

① 宋祁称自己修《唐书》“未尝得唐人一诏一令，可载于传者。唯舍对偶之文，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宋景文笔记》），这与欧阳修撰《唐书》“本纪，用《春秋》例，削去诏令”（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做法一致，正体现了他们反骈尊古的相同的文学观念。又，宋祁不载诏、疏，而全文载录韩愈《平淮西碑》、柳宗元《贞符》，与欧阳修一样，推尊韩、柳之意鲜明可见。

② 王树民《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二一，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0页。

③ 《欧阳修全集》附录《先公事迹》，第2629页。

④ 《旧唐书》卷一〇六《李林甫传》，第3241页。

⑤ 新、旧《唐书》皆于《外戚传·序》中指出，外戚之盛，缘于内宠，而非功业，鲜有能以德礼进退、全宗保名者，因此立《外戚传》“以存鉴诫”。在新、旧《唐书》中，长孙无忌等以勋贤任职者皆不入《外戚传》，而杨国忠则由《旧唐书》的大臣列传被转入《新唐书》的《外戚传》，这本身即已体现作者的态度。

⑥ 《宋史》卷三一九，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381页。

⑦ 《欧阳修全集》卷四七《答吴充秀才书》，第664页。

⑧ 马东瑶《欧阳修的文学教育与宋代文学的发展》，《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

现在欧、宋笔下的。而《新唐书》所浓墨表现的张九龄对选士的重视、对使典胥吏的不齿，以及他的儒雅醇厚、立朝谏诤、处穷自若、文史自娱，无不体现着以兼济天下为己任、注重名节修为而以文士身份自重的宋代文人士大夫最为推崇的风范特征。

值得一提的是，《新唐书》所增补的张九龄献《赐白羽扇赋》事正透出作者浓厚的文人趣味：“九龄既戾帝旨，固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篋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在新、旧《唐书》的叙述中，张九龄的罢相都与谏用牛仙客、终为李林甫所谗有着直接关系，所不同的是，《旧唐书》丝毫不提白羽扇之事，《新唐书》则叙述颇详。张九龄以《白羽扇赋》表达了为君效命、杀身不悔的决心和纵然被弃也绝不背君的忠贞。其中用到班婕妤秋扇见捐之意，或许还隐含了陈皇后的长门献赋之情，在这以男女之情隐喻君臣关系的文学传统背后，正体现着张九龄的文人士大夫的特色；而在《新唐书》的诗意叙述中，不难看出同样身为文人士大夫的欧、宋的情感倾向和同情的理解。最后，“朝廷士大夫持禄养恩矣”一句，则又将文学的诗意引向政治的深意。张九龄的献赋没能感动玄宗，于是，九龄罢相，清政结束，政治自此转向。这一叙述当中，同样暗含着作者的褒贬态度。后来刘克庄则爱憎鲜明地说：“二相去留际，中原治乱分。异时马上泪，遥洒曲江坟。”^①

北宋叶梦得认为《新唐书》所记白羽扇赋事出自唐郑处诲《明皇杂录》，事实上，这一说法并不准确。《新唐书》即使借鉴了《杂录》，张九龄的形象也发生了很大改变。《杂录》称九龄因为明皇秋阳赐扇而“惶恐，因作赋以献”，这与《新唐书》记载的多次直言忤旨的九龄形象显然是矛盾的，《新唐书》便弃之不录，着力表现的是九龄守正不回的一片忠心。而叶梦得对于张九龄的称誉，较之《新唐书》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引《曲江集·白羽扇赋》序为证，指出赐扇是在开元二十四年盛夏而非秋阳，且并非针对九龄一人，而是包括林甫在内的所有宰臣，故九龄之献赋并非“顾恋不忍去，托祈哀以幸苟容”，而是以赋致意，体现的仍是其“君子大节进退”^②。这种热情的褒扬，正表明随着《新唐书》的流播，张九龄已逐步确立其新型文士的典范地位。

三 典范的确立：宋人对“九龄风度”的集体性接受

张九龄以外在儒雅、内蕴刚劲的“九龄风度”成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楷模，这一形象的形成，既是以真实的张九龄为蓝本，无疑又与接受者的选择密切相关。在中晚唐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张九龄是作为开元盛世最后一位贤相而为人所追慕，但他的独特意义并没有引起众人过多的关注，有时甚至不乏微辞。如中唐刘禹锡有《读张曲江集作》并引，对张九龄建言放臣不宜与善地愤愤不平，认为其“伎心失恕”，而终致无后^③。刘禹锡的批评，与他自身被贬岭南的经历有关，尽管他也提到张九龄有“识胡雏有反相，羞凡器与同列”之美，但对张的怨愤之气更是溢于言表。其后，杜甫有《八哀诗》，叹怀他所推崇的八位唐贤，最后一位即张九龄。这首四十八句的五言诗，结构相当整饬，仇兆鳌把它分为四段，前八句“称其品格不凡”，最后八句“叙其家居存歿，而终之以哀吊”，中间三十二句分成两部分，各以十六句分叙其“仕进履历”和“诗才文学”^④。与《八哀诗》咏王思礼、李光弼等多叙政治功业不同，杜甫对张九龄文才与政事的并重，正奠定了宋以后文人士大夫所推崇的“九龄风度”的基本内涵。

① 刘克庄《杂咏一百首·李林甫》，《全宋诗》卷三〇四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6341页。

② 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6页。

③ 卞孝萱校订《刘禹锡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63页。

④ 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一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2页。

到了宋代,在振作士风的时代氛围之中,“九龄风度”获得充分阐发。欧阳修、宋祁通过对《旧唐书》的改写,在《新唐书》中确立了“九龄风度”的内涵,从此得到广泛认同。而张九龄曾遭受过的非议,也得到宋人的全力维护而一一为之辩解、修正。如刘禹锡称张九龄“忤心失恕”而导致无后,宋人便多有质疑和反驳。赵明诚从考辨的角度论证九龄并非无后^①,晁补之则从更主观的道德批判的角度直接称刘禹锡之说为“小人诋君子”^②。

“小人”与“君子”这一对出自于孔子《论语》当中带有强烈的儒家道德评判的指称,恰恰也指出了宋人所接受的“九龄风度”的一个核心意思:以儒为本。唐代是儒学中衰的时代,三教并行,士人往往更热衷的是佛教与道教,在中唐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以前,张九龄以一个复古的儒者形象出现,可谓是儒学复兴的先行者了。据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明皇于勤政楼以七宝装成山,座高七尺,召诸学士讲议经旨及时务,胜者得升焉。惟张九龄论辩风生,升此座,余人不可阶也,时论美之。”^③在唐代讲究“书、判、身、言”的选官制度下,时论所美可能更多的是张九龄的善论辩,正如《开元天宝遗事·走丸之辩》所记载的:“张九龄善谈论,每与宾客议论经旨,滔滔不竭,如下坂走丸也,时人服其俊辩。”^④这“俊辩”正是唐人眼中“风度”的体现;但在致力于儒学中兴的宋代,九龄的擅长“经旨及时务”更为他们所关注,九龄又素来以文名世,且其文中一再强调“君子”之贞、节、义、德,——这正提供了一个欧阳修们所推崇的能够承担国家与社会责任、体现儒家之“道”的新型文士的雏形。

玄宗当年也曾为张九龄既是“儒学之士”、又有“王佐之才”而兴奋不已(《开元天宝遗事·七宝山座》),然而他对李林甫、牛仙客的重用,使以儒为本的文士最终在与法家和胥吏的斗争中败北。李林甫以法家思想为理论依据,联合胥吏出身的牛仙客,力图推行以法治国,以取代儒家的“人治”^⑤,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其实自有其可取之处,但在重儒轻法的宋人眼中,却是极令他们反感的。据南宋王楙《燕翼贻谋录》:“杨万顷杀张审素,审素二子瑄、琇为父复仇,杀万顷,张九龄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杀之,而二子竟伏大刑。盖九龄君子,喜人为善,林甫小人,嫉人为善,好恶不同故也。苟其父罪当死,子不当报仇,父死不以罪,或非出上命,而为人所挤陷以死,可不报乎?审素之仇所当报也。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府鄠县民甄婆儿报母仇杀人,诏决杖遣之,惜乎瑄、琇之不遇圣时明主也。”^⑥在这件轰动一时的“杨万顷谋杀案”的裁定中,张九龄以儒家忠孝之说,认为应宽免为父报仇而杀人的两个少年,李林甫则认为,法律应直接定罪量刑,不当用人情来解释;最后玄宗支持了李林甫,称“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⑦而将二子付有司杖杀。张九龄与李林甫的这场斗争实际上体现了儒家和法家的冲突,是秉持不同治国理念者之间的交锋,但在王楙看来,却是具有不同道德品性的“君子”与“小人”的斗争;而他作为对照所举本朝的例子,不仅贬斥支持了李林甫的唐玄宗非为“圣时明君”,同时正说明宋代早已重回儒家“人治”的轨道。而李林甫的奸邪小人、张九龄的儒家君子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两宋之际的张纲便明确表示:“呜呼!九龄文章风度见称一时,而林甫奸邪无学术,仙客起于胥吏,则三人贤不肖明甚,而明皇用舍如此,惜哉!”^⑧

正是在“以儒为本的文士”这一基本形象之上,宋人强调和放大了他们眼中的九龄之贤,修订甚

① 金文明《金石录校证》卷二八《唐张九龄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页。

② 晁补之《济北晁先生鸡肋集》卷四八《唐旧书杂论》,四部丛刊本,上海书店1989年版,第13页。

③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一《七宝山座》,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3页。

④ 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卷四《走丸之辩》,第56页。

⑤ 参赵剑敏《唐代一场被历史湮没的法制运动——李林甫执政性质新探》,《学术月刊》2004年第2期。

⑥ 王楙《燕翼贻谋录》卷四,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2页。

⑦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三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811页。

⑧ 张纲《华阳集》卷二〇,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1册,第123页。

至改写了他们所认为的“瑕疵”，从而树立了以“九龄风度”为核心要义的一类新型文士的典范。“风度”一词，常被用来形容特重气度、仪容的魏晋时人，如宋周必大称“晋人风度不凡”，明方孝孺称“晋宋间人以风度相高”^①，而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魏晋人的种种言谈举止，由个性、情感、才藻构成了魏晋时期最被推崇的风度气质，这种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才情外露、潇洒飘逸、狂傲不羁的深刻印象。入唐以后，新时代下的“盛唐气象”取而代之，然唐人对魏晋风度仍有不少追慕效仿，体现之一便是并不以露才扬己和恃才傲物为耻^②。如史载王勃“倚才陵籍”，杨炯“恃才凭傲”，杜审言“恃高才，傲世见疾”，陈子昂“貌柔雅，为性褊躁”，王翰“恃才不羁”，杜甫“性褊躁傲诞”^③。这也就理解《旧唐书》对张九龄“性颇躁急，动辄忿詈”的记载。或许在《旧唐书》作者看来，这并非是对张九龄的贬斥之语，只不过是当时才子的普遍习气而已；就张九龄自身而言，这种性格虽是地域习性的体现，然而他对自己的出身一向是有些自卑的，若非并不受中原时风的排斥，想来他当有所克制和改变。但是在宋代，这种风气却是不受欢迎的。宋人转向内敛，讲求克制、含蓄、中正和平，不喜露才扬己、放达不羁。庆历时期，梅尧臣等七人曾聚会，互冠以“某老”之名，并称呼缺席的欧阳修为“逸老”，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信中以孔孟、《诗》《易》等儒家思想解释七老之名，并表示不愿他人以“轻逸”视己而坚持改为“达老”^④。又，欧阳修曾为同样出身韶州曲江并参与《新唐书》编撰的好友余靖撰写神道碑，称其“为人资重刚劲，而言语恂恂，不见喜怒”^⑤。《论语·乡党》曰：“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所谓“恂恂”，指恭顺之貌。欧阳修对余靖性情气质的描绘，正如《新唐书》对张九龄的刻画，是宋人所赞许的内蕴刚劲而外在儒雅的文人士大夫形象。如此，我们便可理解《新唐书》为何将九龄“躁急”、“忿詈”之类的描写一笔抹去。正是在改写的基础上，宋人完成了砥砺名节、守正不回、处穷自若、儒雅醇厚的“九龄风度”的刻画，从而树立了他们理想中的新型文士之典范。

据欧、宋的行状、墓志铭等，“以文章道德为一世学者宗师”（吴充《行状》）的欧阳修，性格也如张九龄一样“刚正质直”（吴充《行状》），英宗尝面称修曰“性直不避众怨”（《神宗实录本传》）；又“见义敢为，襟怀洞然，无有城府，常以平心为难，故未尝挟私以为喜怒。奖进人物，乐善不倦，一长之得，力为称荐，故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惟视奸邪，嫉若仇敌，直前奋击，不问权贵。后虽阴被谗逐，公以道自处，怡怡如也”（韩琦《墓志铭》）^⑥。其立身处世的刚正不阿与宦途贬逐中的泰然自若，与宋祁的“言事謇謇，无所回避”、“炳焉彬彬，昌焉谔谔”（范镇《宋景文公祁神道碑》）^⑦，都与“九龄风度”的内涵颇为吻合。欧、宋是以自身践履和宋人赞赏的个性气质“塑造”了九龄，还是服膺于九龄而使自己亦颇具其“风度”呢？这是耐人寻味的。

《新唐书》成书二十四年后，元丰七年（1084），宋代另一部煌煌史著《资治通鉴》由司马光等完成。司马光深受庆历学风和士风影响，他对张九龄事迹的编撰以及褒贬的态度也正与欧、宋一脉相承。《资治通鉴》曰：“二十八年春……二月，荆州长史张九龄卒。上虽以九龄忤旨逐之，然终爱重其人。每宰相荐士，辄问曰：‘风度得如九龄不？’”^⑧其中全不提笏囊、风姿之事，所谓“爱重其人”之语，正说明在作者看来“风度”着重体现的是其内蕴。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可谓是一篇以长诗写就的九龄传记，从其孤起荒陬，到推挽正人，识禄山仙客，破房帷阴谋，上千秋金鉴，赋扇陈情，

① 《御定佩文斋书画谱》卷七《宋周必大论书》、《明方孝孺论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9册，第232、243页。

② 林继中《魏晋风度与盛唐气象的转换》，《人文杂志》1995年第2期。

③ 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卷一、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40、67、109、142、396页。

④ 《欧阳修全集》卷一四九《与梅圣俞四十六通》，第2444页。

⑤ 《欧阳修全集》卷二三《赠刑部尚书余襄公神道碑铭》，第366页。

⑥ 《神宗实录本传》、吴充《行状》、韩琦《墓志铭》，《欧阳修全集》附录，第2656、2690、2699页。

⑦ 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上卷七，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19页。

⑧ 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四“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第6840页。

直道忘怀，历数九龄一生“忠谏”之行迹与“瞻蔚”之文词，最后落实到本诗所咏之“曲江画像”，称其“风度严凝见颜色”，较之王偁《谒张文献公祠》着重赞赏相业之功的“九龄风度”，做了更为精当而详尽的描述^①。同样位至宰辅、功业彪炳而诗文“雄深雅健”（《四库提要》语）的李纲，对于“九龄风度”自是最有深契其心的“同情之理解”。

“九龄风度”正是在宋人的接受中成为一个赞誉文章政事两相能者的熟典。王之道《追和贾明叔侯陟明二侍郎瑞香二首》其二曰：“深院重帘数尺墙，对花何必竟烧香。九龄风度高难挹，举世纷纷漫笏囊。”^②作者称“九龄风度”自有其深意蕴藉之处，而并非体现在身佩笏囊一类的表面工夫，可谓与欧阳、司马等史家遥相呼应；“九龄风度”之内涵也相对固定下来成为作家创作时用来称扬他人的、其意不言自明的喻体。如彭汝砺《和执中寄师厚同年》其二“啸吟久不过诸葛，丰度今谁似九龄”，以“九龄风度”赞誉宰辅陈执中；王洋《贺张参启》称美所贺者“靖以有容，刚而不犯。九龄风度，表在缙绅”^③；陆游以“诗骚湘水客，风度曲江公”为王成之作挽辞^④；楼钥亦以“九龄风度”赞扬南宋身登二府的著名文人范成大，又在《尚书张公挽词》中以“文靖饶风度，高皇记曲江”褒扬这位张尚书，至于其《次韵章枢密赋吴彩鸾玉篇》以“九龄美风度”赞赏章枢密之书法，则是因书见人，还是将章枢密与九龄进行类比而称扬之^⑤。另如“九龄风度照岵台”（释德洪《代夏均甫宴人致语一首》）、“岩廊风度待张龄”（项安世《又代作》其二）、“曲江风度乃不名”（敖陶孙《次韵张长公宠赐初度致祷之语》）^⑥，此类表述不胜枚举。“九龄风度”已经成为熟典，这在宋人对同样身为开元贤相的宋璟、房琯和本朝宰相李沆之“风度”的对照性接受中，可更清晰地体现出来。《白孔六帖》云“宋璟风度凝远，人莫涯其量”^⑦，《新唐书》则称“房琯风度沉整”^⑧，然而人们并没有因此总结出“宋璟风度”、“房琯风度”，是因为这种内涵单一、浅显的评价在各类史书笔记中并不鲜见，并不能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又，据《宋史·李沆传》：“（沆）尝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风度端凝，真贵人也。’”^⑨同样是皇帝评价宰相，不过宋人对本朝君臣也并不买账，李沆虽为宋初名相，却并无多少可资流传的功勋伟绩，其“端凝”之风度，也不过是外在的风采气度而已，自是远远不及“九龄风度”之内涵丰赡、引人回想。

元明清人对张九龄的接受与宋人可谓一脉相承。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在《张九龄曲江集》的介绍中说：“九龄风度酝籍，幼善属文。元宗朝知制诰，雅为帝知，为相谔谔，有大臣节。及贬荆州，惟文史自娱，朝廷许其胜流。”^⑩完全取自《新唐书》。明邱濬《寄题曲江张丞相祠堂十首》承继李纲之评，以“风度严凝”称许九龄，其诗最后曰“文章功业两皆传”^⑪，与宋人描述的“九龄风度”并无二致。清张际亮有《谒先文献公祠》：“曲江风度想平生，早信渔阳祸已成。名与宋姚参一代，诗先李杜得中声。秋风羽扇孤忠感，夜雨淋铃远幸情。祠祭已伤元老意，九原应恋翠华行。”^⑫诗歌以“风度”冠于首句，

① 李纲《次韵顾子美见示题曲江画像》，《全宋诗》卷一五五四，第17648页；王偁《谒张文献公祠》，《全宋诗》卷二六五一，第31067页。

② 王之道《相山集》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2册，第622页。

③ 王洋《东牟集》卷一一《贺张参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32册，第479页。

④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卷三六《王成之给事挽歌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2338页。

⑤ 楼钥《攻媿集》卷三八《范成大赠五官》，四部丛刊本，第14页。其诗分见《全宋诗》卷二五四六，第29498页；卷二五四〇，第29400页。

⑥ 分见《全宋诗》卷一三三九，第15267页；卷二三八〇，第27432页；卷二七一〇，第31882页。

⑦ 《白孔六帖》卷二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91册，第431页。

⑧ 《新唐书》卷一三九《房琯传》，第4625页。

⑨ 《宋史》卷二八二《李沆传》，第9538页。

⑩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三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45页。

⑪ 邱濬《琼台会稿诗文集》，雁峰书院藏版，光绪五年刻本，第31页。

⑫ 《张亨甫全集》卷一九，转引自《张九龄研究论文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7页。

其后写到九龄的政治远见、一代相业、诗坛贡献与孤忠之气，所体现的是一个文才卓越、兼济天下而又遭谗被逐的文人士大夫形象，这类得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带些悲剧色彩的人物正是最令文人钦敬叹惋的，诗歌由此对《新唐书》、《资治通鉴》所叙述的开元贤相、一代辞宗的“风度”作了诗意的描绘。

随着门阀贵族的消灭和科举制度的日益成熟，自宋以后，以寒士庶族为主体的文人士大夫阶层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政治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九龄风度”获得了宋人特别的关注。张九龄出身于久为“蛮荒”之地的岭海，尽管位极人臣，却始终有着消弭不去的孤独感和自卑感，这在门阀制度的影响尚未消除的开元时期来说，自不足为怪，而张九龄所不能料到的是，他的意义不仅在于成为出自岭南的第一位名臣贤相，更重要的是，其出身寒微、科举入仕以及“九龄风度”，使他颇具象征性地成为此后文人士大夫的典范。门阀制度随着唐帝国的结束而烟消云散，宋代以对科举取士的大力推行而使庶族寒士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主角，——这是预示着寒族的崛起的张九龄成为典范的客观因素^①；而其主观因素在于，他的文章政事咸有所称、蕴藉文雅的“九龄风度”，正体现着在儒学复兴的新时代背景下对于文士的要求，从而为宋以后的文人士大夫所称赏。在宋人的接受中，“九龄风度”逐渐内化为文人士大夫的理想底色，从此烛照后世，历久弥新。

〔作者简介〕马东瑶，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发表过专著《苏门六君子研究》等。

• 札记 •

“有事”不可能是指“春社”

《文学遗产》2008年第5期严寅春《“有事”为何事》，提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将有事于西畴”的“‘有事’即为春社”。我们认为此说不妥，还是理解为“耕种之事”为宜。

晋代葛洪《西京杂记》：“高祖少时，常祭粉榆之社……既作新丰，并移旧社，衢巷栋宇，物色惟旧。”可知“社”在“里”中，古籍中“里社”连称，如《后汉书·邳彤传》：“陈平敖里社。”“汉时，里普遍立社……即以里名为社名称某某里社。”（宁可《汉代的社》，《文史》第九辑，第8—12页）《通典》卷四五：“其初盖晋元帝建武元年所创……百姓则二十五家为一社，其旧社及人稀者，不限其家。”凡“社”必有“大树”。《世说新语·方正》：“阮宣子伐社树，有人止之。”又《排调》：“谢幼舆谓周侯曰：‘卿类社树，远望之，峨峨拂青天。’”由上可知两汉魏晋“里”、“社”不分，凡“社”必有高大“社树”。

“将有事于西畴”中，“有事”之处为“西畴”，《说文·田部》：“畴，耕治之田。”“春社”应该不会在“耕治之田”里进行，“耕治之田”也不会栽种巨大的“社树”。从“命巾车”、“棹孤舟”、既“寻壑”又“经丘”来看，陶渊明家到“西畴”有一段不少于五华里的距离。所以，“有事于西畴”的“有事”不可能是本村之内的、在巨大社树底下进行的“春社”。

（张诒三）

① 此前科举入仕的张说的为相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不过，张说虽属不入“百家”之数的“近代新门”（孔至《百家类例》），然“其先范阳人，代居河东，近又徙家河南之洛阳”（《旧唐书》），为世居北方中土之人；而出身于“岭海孤贱”（《资治通鉴》）的张九龄，由于两宋以后南方经济、文化的迅速崛起，而更具象征意义。